永不磨灭的时代印记

——读王天瑞《品味乡愁》系列文章随想

顾玉杰

大概始于2015年炎夏，《周口日报》文化版“品味乡愁”专栏，陆续刊登王天瑞撰写的系列乡土文化散记，迄今算来，已近三十篇了。这些文章，每篇我都要细读的。平实的语言，质朴的文字，烙满时代的印记，回闪着岁月的灵光，是四五十岁以上年纪的人品味乡愁、咀嚼人生的一方精神圣土。

王天瑞，是长辈，我尊称老师。老师行伍出身，在部队服役22年，祖国的白山黑水，大漠边关，沧浪海岛，黄土高坡，都曾留下他年轻的足迹。老师一生痴爱文学，在戎马倥偬的岁月中，他先后出版了《江山万里行》《这边风景》《神秘旅程》等作品集，著述等身。转业到地方后，天瑞老师曾在周口市纪委、市文联任职，一直与文字打交道。退休后，赋闲在家的他，大量时间并没有放在含饴弄孙、种花养鸟上，而是继续潜心创作，笔耕不辍。

《周口日报》文化版开设“品味乡愁”专栏时，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向天瑞老师约稿。天瑞老师生在豫东，根在农村，血脉和精神一辈子都与故土相守，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浸润着对家乡的情感。还有一点，就是天瑞老师阅历丰富，感情细腻，对事物观察入微，文字功力深厚。果不其然，年届七旬的天瑞老师，写作“品味乡愁”系列文章得心应手，顺风顺水，成为文化版的专栏作家。作品刊发时，编辑配有漫画插图，文章散发着浓烈的时代气息和历史韵味，人们争相阅读，有的老年人还剪报收藏。据天瑞老师说，他已写成定稿75篇，计划创作100篇，全景勾画和复原上世纪中原农耕文化的历史风貌。

在天瑞老师的这组文章中，我读出了生活的原味，那种平淡、真实，不可复制的原味，这是乡愁系列文章的魅力所在、价值所系。石磨，老井，花轿，夯歌，虎头鞋，货郎担，织布机，寨海子，大铁钟，牲口屋——这是上世纪豫东农村生活的真实“道具”，是中原地区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和见证。作者的老家是一个叫黄村的普通村庄，文章中多见黄村的影子，也可以说黄村是天瑞老师写作这组文章的源泉。在这些文章中，作者不但叙事，也如实记下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触；这些经历很平凡，感触也很普通，然而却是作者自己的，他舍不得丢失，他说掏心窝子的话，要拿出来给与他有同样经历的人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时光，分享一份相似的回忆。

在《乡村老井水味儿甜》中，作者写道：“老古井的水，冬暖夏凉，细品品，甜丝丝的。夏日正午打出的井巴凉水，喝上一瓢，身上的汗立马散去”。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农村古井的热爱和怀念。在《夯歌声声唱富康》一文中，作者生动地描述了农村打夯的场面：“来看打夯的人越来越多，场面越来越壮观。老人、孩子、大闺女、小媳妇……欣喜、欢笑、鼓掌、指指点点……这时，夯司令更显英雄本色，把夯歌唱得时而悠扬、时而幽默、时而委婉、时而激越”。在《好个奇怪的货郎担》中，货郎老钱头是底层老百姓智慧和乐观的代表，他游走四方练就的口才，让作者打心眼里佩服。“买的买，捎的捎，几毛钱能买一大包。买包针，不值钱，不顶一根好纸烟。买上两包带回家，老婆笑着把你夸：妮她爹，孩他爸，你真是咱的好当家。”老钱头粗门大嗓，连说带唱，风趣诙谐的一段段说词，几十年过去了，作者仍能表述得这样清晰流畅，可见农村生活给作者留下的印象多么深刻！在《春蚕到死丝方尽》一文中，作者先说：“我在少年时代，就曾看到，黄村周围的路边、坑旁、河堤、寨墙上，处处长满了高高大大的桑树，一到春天，绝大多数人家都忙忙碌碌地采桑养蚕”；接着又无限感慨地写道：“有了蚕丝还能愁绫罗绸缎吗？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劳动人民创造并不断发展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技术，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然而遗憾的是，农村里养蚕的人逐渐销声匿迹了。”读着这些文字，我们仿佛又回到年少时代，抚摸着故园的一草一木，沉浸在上个世纪的峥嵘岁月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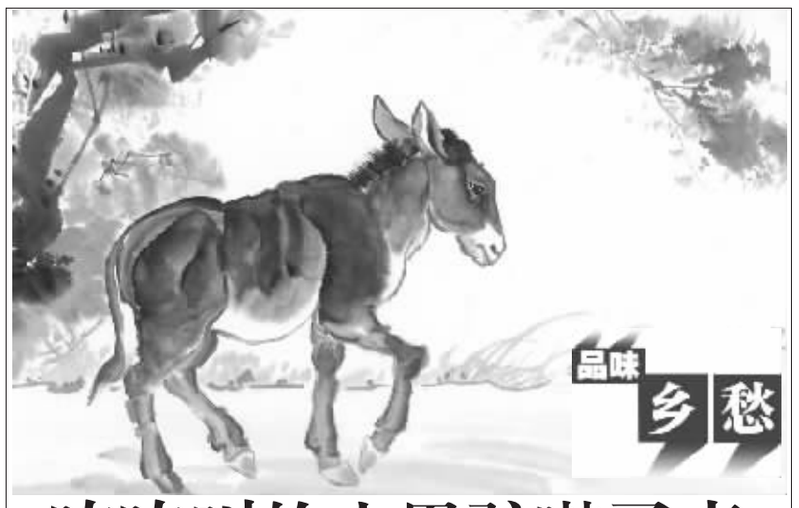
在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中，没有哪个百年像二十世纪那样激荡、壮阔、多彩。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交织，信息化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科技的突飞猛进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把人类带入一个充满未知和挑战的新世纪。毫无疑问，在这场急风骤雨的变革中，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农耕文化，正逐渐消褪原色，走向历史深处，成为留存在那一代人记忆中的一抹乡愁。

恰如编者在《开栏的话》中表述的那样：乡愁是老家屋顶上那一缕炊烟，她代表着人们眷恋故土的永恒情感；乡愁是故园的蓝天白云和母亲的声声呼唤，她是沉淀在心灵深处不可替代的挚爱与留恋。品读天瑞老师的这组文章，我觉得所谓的乡愁，即是一种人生的厚度，一种生活的底色，一种精神的找寻，一种情感的回归，一种文化的积淀。

留住乡愁，就是传承。对于天瑞老师的这类文字，人们会以文化苦旅，或文明的碎片形容之。不管怎么说，天瑞老师无心插柳，弄出这浩繁的乡愁系列文章，把我们的个体记忆修复得立体而丰满，也把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点缀得瑰丽多姿。从这个意义上说，天瑞老师对中原乡土文化研究，又起到挖掘、补充和丰富的作用了。

（作者为周口日报总编辑、高级编辑）

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繁荣发展周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周口文化
投稿邮箱：zkwhzk@126.com
新闻热线：0394-8599519



咴咴叫的小黑驴噤了声

王天瑞

在黄村，当家家户户都养牛、养驴甚至养马、养骡的时候，牛驴马骡也就是普普通通的农家耕畜。随着时代变迁，牛驴马骡一天天减少，当减少到只剩王跑家最后一头小黑驴的时候，这头小黑驴竟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

“到黄村看小黑驴去！”不少年轻人和孩子们还真没有见过小黑驴，便蹒跚而来、结队而来、飞奔而来。他们在王跑家看到小黑驴，看到小黑驴吃草、打滚、咴咴叫，就像在动物园看到老虎、狮子、豹子怒吼、穿林、翻山一样，咋看咋觉得稀少、稀奇又稀罕。

王跑家的这头小黑驴已经老了，已经不能干什么活了。清庄上的屠宰户找到王跑，劝他把小黑驴卖掉，并且给的价钱还挺高。王跑笑着摇头说，不卖，不卖，给多少钱也不卖。屠宰户说，你想养到啥时候？王跑说，养到老死。屠宰户悻悻而去。王跑补充说，养到老死也不卖。当然，我知道王跑的心思。在小黑驴还是小驴驹的时候，王跑拉麦子翻了车，被压在麦车底下。小驴驹跑到家，直拱人。家人不知咋回事，跟随小驴驹来到村外，远远一看，恍然大悟，匆忙跑过去，掀起麦车，救出了王跑。王跑曾给我说过，牲口也通人性啊，小黑驴救了我，我也要对得起小黑驴。

驴，又叫驴子或毛驴，被毛多为黑色或灰色，而口、鼻、眼圈和腹下多为白色。驴的脸长，耳朵也长。有时形容人，驴脸瓜达的，像驴的耳朵一样。驴的妊娠期是12个月，马的妊娠期是11个月，所以又有“驴年马月”之说（暗喻事情遥遥无期，难以实现）。母驴3年可产2胎，每胎产驹一头。一头母驴终生可产8至10胎。驴，一般寿命为30年左右。公马与母驴交配所生杂种，叫驴骡。公驴与母马交配所生杂种，叫马骡。驴骡和马骡，力气都比驴或马的力气大得多。千百年来，一代一代的驴们是帮助人类进行繁重体力劳动的亲密伙伴。南宋诗人陆游说：“远游无处不消魂……细雨骑驴入剑门。”唐朝诗人白居易说：“日暮独归愁未尽，泥深同出借驴骑。”

农谚说，草膘料力水精神。驴，日日月月年年，每天早中晚三顿，吃的都是干草——麦草、谷草、大豆秸、花生秧、红薯藤……大约不超过七八斤，还有二三斤粗料——棉籽饼、花生饼、玉米糁、大豆糁、麦麸子……这是人们必须供给的最基本的营养。即便在夏秋季节，这些干草里，若能多少加一点点青草，那就是美味佳肴了。至于水，驴耐热又耐渴，饮水量很少，那就适当给予饮水吧。如果要问驴，还有什么奢望？驴一定会说，唯一的奢望就是农谚说的“马无夜草不肥”，驴也是如此，夜间要再加喂一次草料。这奢望不高啊！要让驴焕发冲天干劲，干草粗料必须让它吃饱肚皮吧。平时，驴性情温顺，与人相偎相依。如果不是累极了，如果不是认为你鞭打无理，驴绝对不会嘶鸣，绝对不会尥蹶子。不过，事后，驴又立马忘掉一切烦恼，依然默不作声地低头干起活来。

听从安排，这是驴的情操。驴，甘当人的不言不语的交通工具——让人乘骑，走南闯北，走东向西……驴，愿做人的不吭不哈的劳动工具——拉犁耕地、拉磙打场、拉磨磨面、拉车运货……主人让干啥就干啥，主人让干啥就干好啥。

干活卖力，这是驴的品德。无论酷暑寒冬，也无论白天黑夜，驴干活，不偷懒，不取巧，不藏奸，不耍滑，不松套，不停步，任凭汗水淋漓，任凭精疲力尽，有多大劲就用多大劲，有多大力就用多大力，一直向前……驴拉犁耕地，每天能耕6至7个小时，一具牲口可耕2至3亩土地。驴供人乘骑，驮个胖胖的小媳妇回娘家，一气能走十多里。

奉献到底，这是驴的精神。常言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可供食客解馋。驴，直到走向生命的终点，仍然为人们做着奉献，甚至任人把驴皮熬成胶，制作成滋补强壮之剂。

我曾在全国的一次美术作品展览会上，看到解放军画家黄胄的传世画作，他在一幅6.9米长的画卷上，画出46头驴——或低头、或昂首、或疾跑、或跳跃、或侧卧、或嘶鸣……栩栩如生，精彩纷呈，令人叫绝。

我曾在全国的一次曲艺作品调演会上，看到一位曲艺家演唱《小黑驴儿》，仍然记忆犹新：“说黑驴儿道黑驴儿，小黑驴儿长得有意思儿，白眼圈儿，白嘴唇儿，花脊梁骨，白肚皮儿，紧衬四只粉白蹄儿，花鞍子儿，铜凳子儿，檀香木刻了个驴座子儿，皮笼套，钢嚼子儿，五彩绒线大鞍子儿，上搭印花小铺底儿，坐着个二八俏佳人儿……”

可以说，赞叹小毛驴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不胜枚举，数不胜数。

但是，随着交通的日益发达、农业机械化程度的逐年提高，养驴的传统用处便没有太大意义了。

当我再次见到王跑的时候，他的小黑驴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王跑告诉我，他把小黑驴埋在了东地岗子上，并栽一棵银杏树。如今，银杏树已经枝繁叶茂。

周家口商贸经营中的监督文化

王爱民

二、借助关公文化监督，以神灵威慑来规范商人的从业行为

由山陕商人兴建的周口最大的庙宇周口关帝庙，供奉着的神灵是关羽。关帝庙的重要内涵就是关公文化。关公从“当时义勇倾三国”的蜀汉名将，到“万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圣化偶像，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来，社会各界对关公不断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结果。从关公身上发掘出来的和被追加到关公身上的美德与美誉，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真实的关公，几乎达到了无人可及而又无以复加的地步。

关公是山陕商人崇敬的精神偶像。他所代表的“忠义”和“诚信”美德，为周口的关帝庙镀上了一层耀眼的光芒。关帝庙通过敬奉关羽，而突出“诚信为本”、“义字当先”的主基调，以弘扬“义中取利”的商业道德——这也是周口关帝庙商业文化最核心、最令人信服的内在精神，是关帝灵魂之所在。关帝庙的建造者巧妙地把这种商德宣言、诚信理念依附在关公身上，雕刻在石碑上、隐喻在装饰图案里，反复渲染，集中体现，约束、警示、教化、监督和鞭策商人要诚实守信、合法经商。其良苦用心天地可鉴。关帝庙的建筑造型、整体布局以及木雕、石雕、彩绘、楹联等不仅艺术精湛，而且内涵丰富，在渲染吉祥和神圣的气氛中，突出体现了“诚信为本”的商业信条、“忠信礼义”的传统文化。在周口关帝庙，对关公的赞美楹联有很多，而这些楹联也成为关帝庙关公文化的内蕴之一。其中石牌坊上有“读好书说好话，做好人行好事”、大殿上书写的“忠能择主鼎足定汉室天下，德必有邻把臂呼岳家父子”的赞誉；拜殿则有“赤胆扶汉尽忠尽勇千秋豪气参大地，丹心托月重信重义一生高节韶春秋”；春秋阁上有“赤面表赤心千里常怀赤帝，青灯观青史一生不愧青天”、“秉烛持纲常顾影何惭心上日，封金完节义对人不愧性中天”等，这些楹联，构成了周口关帝庙鲜明的关公文化特色。这种道德的教化虽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在当时所处的封建时代，对于倡导“诚信为本”的传统道德观念及商人的自律意识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诚信为本”和“义利相通”观念的影响下，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见利思义，作为当时商人经营的哲学基础，成为商人精神价值观的核心。“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一时成为那个时代商人精神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制约人们行为的准则。在周家口发展的轨迹上，深深镌刻着“义”字的烙印，做人讲仁义、经商讲信义、亲人讲情义，对父母讲孝义。这种义就是道义和正义的结合。明清时期，周家口市场上用的是16两秤。俗话说的半斤八两就缘于此。16两秤上的秤星，每一颗代表一颗星宿，它们是：北斗7星，南斗6星，再加上福、禄、寿3星。给客人秤高就“增福、加禄、添寿”，倘若缺斤短两，少1两叫“损福”，少2两叫“伤禄”，少3两叫“折寿”。在秤杆上嵌这16颗星时，其星的颜色必须是白色或黄色，不能用黑色，比喻做生意要心地纯洁，不能昧着良心(黑心)挣黑钱。这些秤星时时刻刻在告诫生意人：务必买卖公平，切莫缺斤短两伤害自己。这种神话式的威慑蕴含了经商之道——诚实守信，助推着周家口的商业繁荣。以神灵的威慑，来凝聚、规范和教育同行业所有人员，做到遵纪守法，诚实经营，童叟无欺。

周家口商人把经商之道排列为：第一是守信，第二是讲义，第三才是取利。“商家是要追逐利润，但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绝不干损人利己的事。”在周家口的各种商会（会馆），每个月的初一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校秤，把各商行使用的秤收起来，一家一家校对。哪家用秤不合规定，轻者罚款、罚聚餐、罚唱大戏，重者停业整顿、直至取消经营资格，永远不得经商。校过秤后，贴上标签，合法使用。如发现使用未校的秤，立即处罚，决不迁就。这种用商会管理商贸活动的方法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

在周口关帝庙保存的各种石碑中，其中有道光十七年“重修关帝庙碑”，碑文详细记述了周家口320余家商行店铺捐资的情况，详细地记述了维修关帝庙捐资商号的名录、捐资数额以及建筑开支情况。捐资数额大的几百两白银，少的几两。每项开支精确到两、钱、分。用的油漆、颜料、石灰、甚至麻捻都清晰记录在案。这种精确入微的财务公示，更是“诚信为本”精神的褒扬和监督文化的直接体现。经得起时间、历史、人民群众的检验。这些行会商业规则和财务公开制度所蕴涵的商业道德、诚信观念、价值取向、管理规程等仍是当代社会需要传承和发扬的经商精神和监督文化。

（中）

周口记忆

袁世凯与近代朝鲜

范闽杰

进军朝鲜

三、果断出兵

此时发生了一件极富中国特色的个人事件，它不仅严重影响了中朝外交史，甚至对东亚的外交格局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以这一节我们不妨采取倒叙的方式来介绍中国果断出兵朝鲜的情况，以便我们对历史能有更全面的了解。

由于中国果断出兵，朝鲜壬午危机初步化解，局势很快稳定下来。“消息抵京之后，北京大小京官都大兴奋，尤其是平素不满李鸿章之清流，都认为假使李鸿章不丁忧，(而由李鸿章)办理此案，决不能如此迅捷。有的说：‘李鸿章决计不肯派兵’，有的说：‘即使派兵，亦不肯以全权交付吴长庆。’”①一时间，对李鸿章和张树声外交风格的比较成为清流派重要的谈资。原来朝鲜壬午兵变爆发时，李鸿章因丁母忧获假百日，回原籍治丧，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暂由两广总督张树声代署。我也倾向当时清流派官员的上述意见，如果当时由李鸿章在衙处置，结局很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有一件史料完全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这种推测。

决定出兵后，张树声专门致函合肥，征求李鸿章对出兵朝鲜的意见，六月三十(8月13日)，李在《复张振轩制军》信函中主张“相机调停，自是不易办法。…至调派陆军，尤须妥筹。”并建议，如果必须大举派兵的话，也应派驻扎天津附近之刘盛休的铭军，由“稍有智谋”的吴殿元统领东征。从这封复函看，首先李鸿章依然把“调停”看作是外交活动中“不易”的良方。而“以夷制夷”，调停妥协也正是李鸿章绥靖政策的实质。其次，从海路前往朝鲜，山东半岛北侧是最近的地方。从烟台到朝鲜汉江口，以当时的舰艇速度，一天一夜亦可到达，而从天津塘沽到达汉江口则需要三天时间。李鸿章建议张树声从天津调铭军入朝不仅反映出心存私念，且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更会贻误战机。李鸿章所以建议这样做，因为吴长庆在山东帮办海防时，时常和李鸿章意见相左，李鸿章对吴长庆处处制肘。为巩固国防大计，吴长庆谢绝好心人的劝说，毅然上书朝廷直陈意见，引发李鸿章极度反感，两人因此结下深深的梁子。综上所述，如果没有张树声代李鸿章暂署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中国不会大出日本预料而神速出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稳定事态；如果没有张树声掌控北洋权柄，即使最终无奈出兵，也轮不到吴长庆的庆军去朝鲜建功立业，自然袁世凯也就难碰上这出头之机。大清是幸运的，朝鲜也是幸运的，袁世凯更是幸运儿。

接到东京公使关于朝鲜兵变，及日本政府反应的电报后，张树声一方面向总理衙门报告，一方面派人紧急会见正带使团在天津学习洋务的朝鲜领选使金允植，了解事件真相，共同商议对策。金允植请求清政府迅速出兵，以防被日军抢得先机。金允植请求道：“烦乞中国饬派兵船几只，陆军千名，戒严以待…伐叛讨逆，扶危定乱，并自由中国主之。”8月2日，驻天津的朝鲜问议官鱼允中面见天津海关道周馥催促清政府出兵，并表示愿意随中国舰队回朝鲜负责调查事变情况。

和金允植达成共识后，张树声遂与总理衙门协商出兵干预事宜。与此同时，张树声开始着手军事部署。“六月二十四日(8月7日)，海军提督丁汝昌至登州，持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张树声之手函，面呈吴长庆。函言日本干涉朝鲜内政，促吴长庆即日赴津，密商机要。长庆偕(张)謇于第二天乘轮赴津。二十六日，船抵大沽口，树声派员引导，径至某公馆下榻。不久树声与其幕友何嗣焜，微行至该公馆，密商派兵东征，并研究措理李昰应及对付日本之方案。晤商凡两次，关防极严，在座除树声，长庆外，惟何嗣焜及謇二人。二十八日黎明，长庆及謇乘轮返登。二十九日(8月12日)抵登州后，长庆即发紧急命令，预备开拔。七月三日(8月16日)即帅六营军队，登轮出发矣。又据张謇告我，张树声与吴长庆会谈，何以如此之秘密？因恐日本人探知消息，于军事不利也。树声曾言，据英领事报告，日本在北京、天津都有间谍，而重要行政机关之官吏、书办、仆役，多有为之耳目者。前吴长庆到津，即赴北洋大臣官署谒见，恐不能秘密云。”②

8月9日，张树声命丁汝昌、马建忠帅“超勇”、“扬威”、“威远”三舰从烟台启程前往朝鲜“东渡观变”。并安排金允植、鱼允中随行。于次日抵达朝鲜仁川。此时，日军舰艇金刚号已经进驻仁川港，日军亦正在陆续到达。丁汝昌、马建忠等人与日本使馆人员接触，并派人全面了解兵变真相。8月12日晨，丁汝昌返回天津复命，马建忠继续与日本使馆沟通，留“超勇”、“扬威”两艘军舰于仁川，以示威慑。

得到丁汝昌的详细报告，张树声愈感事态严重，更加紧锣密鼓筹划出兵。8月13日张树声向朝廷急报《奏朝鲜乱党滋事遵旨派兵保护折》：强调“水师之外，必当派陆兵。北洋防军惟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所部淮军六营驻扎山东登州，由轮船拔队东渡，最为径捷。”接到张树声奏报，事关紧急，朝廷于当日即颁下谕旨：“朝鲜乱党滋事，张树声已派提督丁汝昌等酌带兵船，驰往查探，并添派提督吴长庆统带所部六营，克期拔队东渡，所筹甚合机宜，即著饬令吴长庆等相机因应，妥筹办理。”

吴长庆接到东渡指令后，丝毫不敢怠慢，加紧筹备工作进度，他亲往营中视察，宵衣旰食。但部队暮气沉沉的现状让他深以为虑，怎么也兴奋不起来。开拔在即，将官不愿出国远行，纷纷称病告假，请返原籍；士兵擅自离队，开小差普遍；不久将是大比之年，幕府中亦是人心浮动，去多留少。张謇看出了吴长庆的心结，建议道：“我于移营登州后，亦颇感军气不如驻扎浦口发扬。(我们)宜乘此机会多多拔擢青年，使之耳目一新。”③吴长庆闻言，知张謇已心存成熟想法，便迫不及待地问：“先生，以为哪些青年可用？”张謇向吴长庆转述了袁世凯之前向自己表露的心志和理想，趁机推荐袁世凯，并称赞袁世凯“才气可用”。

吴长庆点头不语，似已采纳了张謇的意见。

筹备开拔，军务千头万绪，吴长庆“以前敌营务，全全委任张謇办理”，同时重要公文亦需要张謇夙夜草拟，13日、14日两天，张謇代拟出《陈援护朝鲜事宜疏》、《谕朝鲜檄》。军务紧急、公文繁杂，张謇实在难以应付，以“诸务冗集”为由，再次力荐袁世凯佐理营务。吴长庆遂委任袁世凯会办前敌营务处。清朝经制军中的“会办营务处”，就相当于秦汉朝之前的军咨祭酒，三国魏帝之后的行军司马，现代部队建制中的参谋长，是协助首长处理部队各种具体事务的第一忙差。清军出发前，无论是后勤物质调备，装备运输管理，行军线路勘定都是营务处的活。袁世凯都能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处理得井井有条，深得吴长庆赏识，张謇也因此在吴长庆那里落得个辩才识人的美名。

“8月8日，吴长庆到天津接受任务。回防后即令张謇筹划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此时正当举行乡试之期，幕僚大都回家准备参加考试。袁世凯却留营中。吴从爱护出发，劝其去考举人。袁自知考不上，但说不出口来。正在为难之际，忙得不可开交的张謇说：‘大帅不要叫慰亭去考了，就让他帮我办办出发的军务吧。’为袁世凯解了尴尬。吴同意后，张即派袁赶办行军应用的各种物件。袁世凯的学问虽然了了，可是实际办事能力却很有一些，限他五六天办好的事，他不到三天就能办妥。”④

上述内容以后被很多传记作者引述，据此认为袁世凯所以要去朝鲜平乱是因为自知科举无望。袁世凯秋闱新败是事实，但由此断言他因不敢再参加考试而赴朝逃避并不妥。袁世凯自幼“不喜为章句之学，潜求经史大义，尤好读兵书”⑤。效命疆场，马上封侯一直是少年袁世凯的理想之路，所以，当赴朝戡乱的命令到来时，袁世凯应当暗自庆幸，因为面临的并不只是敢不敢再去考试的胆识，而是一种明白的人生抉择。是在异国平乱中靠军功立身，还是再去秋闱中奋力一搏？袁世凯上辈出了两位进士，两位举人，但无一例外都是靠军功才最终走向人生巅峰的；其次，秋闱还会再来，去朝鲜建功立业的机会仅此一次，稍纵即逝。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权衡，袁世凯的选择都会是唯一的，那就是：赴朝参战，在腥风血雨中寻求进身的阶梯。

（未完待续）

注：

①《张謇传记》刘厚生著，上海书店，第15页

②同上，第12页

③同上，第8页

④《袁世凯全传》侯宜杰著，当代中国出版社第11~12页

⑤《容庵弟子记》，沈祖宪等著，第2页

周口名人